



儒学在思考

(2005-7-11 13:27:50)

作者：牟钟鉴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促进文明对话与交流，是由于它有如下特质。第一，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它为社会提供了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即所谓人生常道，又把它根植于自然之道和共同人性之中，没有归结为某种至上神的启示，因而也没有一般宗教的狭隘性与排它性。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人皆有之。表现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道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没有忠道，不能体现利他为善的道德精神；没有恕道，也会使忠道变成偏执的爱，从而破坏人际的和谐。忠恕之道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平等宽容精神，它是人类社会公德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和信仰，遵守它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第二，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逐渐成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和多样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在它的指导下，《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事共存的宇宙观；《易传》发展出“各正性命”、“同归殊途”的多样性文化观；宋明儒学发展出“理一分殊”的“一”、“多”互涵的哲学观；近现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开放沟通的社会观；民国一批思想家提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现代多元文化观；当代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和而不同”包含四大原则：一是差异原则，二是平等原则，三是和谐原则，四是互补原则。它是一种文明、开放和理性的文化观。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多元兼容的主流文化观引导下形成多姿多彩的面貌。

第三，儒学的中庸之道，具有持中、协调、理性的特色，适用于稳定社会和调解冲突。孔子说：“过犹不及”，反对偏激行为。《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主张照顾矛盾双方的利益。孟子说：“仲尼不为己甚者”，认为做事要合情合理。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化形成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对于调适宗教与社会的矛盾、协和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摆正维护固有文化与容纳外来文化的关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偏激主义是经常发生的，但都没有成为长期的主流的思潮，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是短命的，而且受到批判，名声很差。反之，文化改良主义和社会调和论总是受到欢迎。

第四，儒学具有天下一家、天人一体的情怀，容易克服国家、民族和信仰的障碍，把仁爱中和之道推广到人类全体和天地万物。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易传》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礼运》讲：“天下为公”。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家庭，人类也应是一个大家庭，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仁心本于孝悌，而要推广到世界和宇宙。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是共生互爱的关系。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所以人类内部仇则俱损，爱则共荣。这种人道主义具有博大的胸怀，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凝聚众多民族并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五，儒学对于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说明，表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儒学看到了国家、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承认大国的主导作用；但它认为大国不能仅凭军事实力，还要树立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威望并有利于天下太平。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此乃仁德之力；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认为大国应实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实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则会“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的思想当时虽被目为“迂阔”，但后来秦朝武力强大而国运短促的历史教训证明，孟子是有道理的。大国之强，不仅在军事，更在有道德感召力。故历代强大王朝，对内注重“为政以德”，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而以穷兵黩武为失道。“化干戈为玉帛”、“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国际秩序。

儒学在思考，儒学在作现代的思考；儒学在反思自身，儒学也在考察世界。

儒学产生于宗法等级社会和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上，虽然有丰厚的内涵，也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及工业文明的地方。所以当西方文明挟其现代优势席卷全球并成为东亚社会主流文化之后，儒学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到猛烈批判，并退到边缘，但没有灭亡。它经历了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反思，清除了自身陈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精华，在二十世纪后期，终于获得新生，受到国人和世界的重新关注与评价。儒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回归中国，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资源正在走向世界。可以说，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它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应对世界性危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儒学的现代思考，便没有儒学的新生。广义的当代新儒家，便是这种思考的主体。

梁漱溟是儒学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和民主，但“理智活动太强太盛”，对于自然对于别人都取利用征服的态度，造成西方社会焦惶、慌怖、苦恼；中国文明早熟，“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西方文化将有一天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路上。熊十力高扬儒家的道德理性，回归《周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以“体用不二”立宗，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避免沦入宗教的迷狂，亦可以避免浅近的功利主义，这两点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贺麟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的对立，主张用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之更严谨更清楚；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以加强超脱现世之精神；领略西方之艺术，以发掘儒家之诗教，形成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勱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国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是好的，但缺乏民主与科学，故应在高扬自身道统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开出学统，建设政统。西方文化中之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皆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应为一切民族所接受。但西方文化存在着价值独断论或西方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缺乏敬意与同情，一味扩张其文化势力，遂与其他文化或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战争、对抗、核威胁等危机。因此，《宣言》认为西方人应学习东方文化中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圆而神的智慧、仁者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等长处。人类应发展出一大情感，一起思索共同的问题，建立“立人极”的学问，以推动世界和平。《宣言》发表之初，自由派胡适曾指斥它是“骗人的”；但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它，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包含着远见卓识和人文睿智，我们也不能不为《宣言》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所感动。

港台新儒家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杜维明，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对话，为此而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办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使世界各地大批学者不断地走到一起，体现了当代儒者的有容乃大的心怀。他在2001年新加坡一次会议上指出，儒学是在与诸子百家互动中形成的，又是在与佛、道两家对话中成长的，今后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对话中走向世界。他说：“儒家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儒家身份参加过多次世界性宗教对话会议，学术上致力于阐释宋儒“理一分殊”哲理的内涵，用来推动多样性文化之间的沟通。他认为儒家的仁道文化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常道”，同时又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可以在文明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